

大寒

讀享·九州

讀享 
JIUZHOU PRESS
2017年总第43期

本期看点

回忆汪曾祺的旅行与美食

苏轼：人间有味是清欢

王云五：怎样精读一本书

梁启超——一位父亲的来信

袁世凯遗嘱

李贽：另类思想家

胡适：人生“十诫”

目 录

1 / 卷首语：人间有味是清欢

5 / 回忆汪曾祺的旅行与美食

14/ 苏轼：浣溪沙从泗州刘倩叔游南山

17/ 王云五：怎样精读一本书

26/ 梁启超——一位父亲的来信

33/ 袁世凯遗嘱

45/ 李贽：另类思想家

54/ 胡适：人生“十诫”

| 卷首语 |

人间有味是清欢



今日大寒。

“大寒为中者，上形于小寒，故谓之大……寒气之逆极，故谓大寒。”

作为二十四节气的最后一个，用大寒来为一年作结，再合适不过。何来此说呢？

大寒是为极寒，正如方回在诗作《永乐沽酒》中所言：大寒岂可无杯酒。

确实如此，大寒之际，也正值新春到来之时，最美之事不该是炉边围坐，把盏共话吗？当然，这个时候如果窗外再飘落白雪，就算是一种完美。

其实，这样的期许之中，最为关键的点，应该是炉边的好友和同好的志趣。有此，这大寒才转而成为一种美境。

美好的事情，总是期望多于现实。

这次特意选取了一阕苏轼的词作《浣溪沙·人间有味是清欢》：

细雨斜风作小寒，

淡烟疏柳媚晴滩。

入淮清洛渐漫漫，

雪沫乳花浮午盏。

蓼茸蒿笋试春盘，

人间有味是清欢。

这厥词，苏轼在旁边写着“元丰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从泗州刘倩叔游南山”，原来是苏轼和朋友到郊外去玩，在南山里喝了浮着雪沫乳花的小酒，配着春日山野里的蓼菜、茼蒿、新笋，以及野草的嫩芽等等，然后自己赞叹着：“人间有味是清欢！”

之所以喜欢这厥词，是太喜爱这最后一句了。春日这种平凡的清欢，才是人间最有滋味的。其实，大寒之时，天冻非常，而知己把盏，就该属于苏轼提及的此种“清欢”了吧。

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自己的风格和路径，有悲壮雄浑、有苦涩难挨、有清静寡淡，路径迥异，无关对错好坏，只关乎人生取舍。这其中，我本人则偏爱“清欢”这种平凡之境和平淡之美。

汪曾祺先生的文字，平静、不急不

躁，非常平实，但是确让人亲近，其子汪朗先生在回忆父亲最初的作品风格时，也说道，最开始的时候，汪老的文章，他们这几个儿女都不是太喜欢。因为那个时候，正是运动高潮时期，他的文字却反而特别的平淡、安静。等过了多年，再看他们父亲的这些文字，他们终于体味到汪老的通透和这种平实的美。

但凡大家，总有清风徐徐之美。这种美，我想就应该是这种“清欢之味”吧。

大寒之际，是为之记。

再过几日便是春节了，在此，《读享·九州》恭祝诸位新春愉快，阖家安康，幸福！



《读·享·九州》编辑部

2017年1月20日



回忆汪曾祺的旅行与美食(四)

嘉 宾：汪朗(作家、美食家,汪曾祺的儿子)

魏英杰(媒体人)

魏英杰：如果要从你的眼光来总结一下咱们老爷子的一辈子，你觉得他有哪些优点？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其实他还是有很多东西，包括读者能从他的作品里面看出来。



（活动现场）

汪朗：我觉得他自己对自己的评价还是很到位的，他一直说他不是大家，他说大家要写重大题材，写人间的悲苦，他说他只能算一个名家，就是小打小闹很精巧的东西，写一些可能留下来，这和他的阅历和他本身的喜好什么的都有关系。所以他，我觉得他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什么时候都是热爱生活的，无论在什么境遇下，他都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始终不惜的寻求。他不是说特意的，他好像在某种程度上，他有那种，就是想忽视遗忘那些不痛快的事情，所以他写的，每写一篇反右题材的东西，他写的特别抒情，他不在乎那些事情，即便在那种境遇下，他也要挖掘人的美好和生活的美好，而且他用他的那种很优美的文笔把这个体现出

来,我说这是他最大的一个特点。

魏英杰:所以喜欢他的读者,往往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读者,就是非常的能够认同然后反复的阅读,不是说那种流行的阅读,今天凑个热闹看他的书,他的读者都是那种沉下心来阅读这个作品的人。

汪朗:我觉得他的文字确实比较好,他的好不是说那种用词用的很奇特,很简单、很朴实,但里面的韵律特别好,非常平平常常的字,但组合在一块就给人感觉就不一样,就是你很容易进去。因为他觉得他这点比较得意,他觉得他对中国文字的这种体会,他觉得他还是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了。



(1 9 4 0 年代末, 汪曾祺和夫人施松卿)

魏英杰:对,他还有一些什么东西留下来还在整理的吗?

汪朗:基本没有,没有说藏着不发的,因为他以前

就没写什么东西，30多岁有，后来那一段他基本就停止创作了，以后就是随写随发，没有存什么像样的东西，现在可能只有检查还没发。

魏英杰：书信、日记。

汪朗：一堆的检查。

魏英杰：这也是一个缩影，讲沈从文给北京写信就有这么一句，叫“问候，可以问候有人好”看了很感慨，要向人家问好，还有可以问候的，那个时候书信很讲究。

汪朗：时间差不多了。

魏英杰：看看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

提问：我想问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您父亲的作品是您本人喜欢的文学作品吗，其实我觉得老先生之前写的不是很边缘的，但是我觉得这两年他可能成为一个更流行的文学作品，因为我本身是90后，但是我特别喜欢您父亲写的东西，我身边朋友有很多喜欢的，他应该属于更受大众欢迎的文学作品，所以我想问一下您之前阅读和现在阅读您父亲的作品，您的感受会有什么变化吗？

汪朗：这个问题很专业，实际上应该不是家人回答的问题，但是我们家毕竟，他的东西都在手边，所以他发的东西都还差一点，严格说小时候，他60年代发的几篇东西不爱看，就是没故事，就是一种情调，那个时候我们上小学，当时不可能理解他的。以后呢，开始也不是觉得特别好，但是觉得自成一体别具一格，这是能够感觉到的，但是就是觉得，小打小闹。



（1961年，汪曾祺和家人在北京中山公园）

那个时候，80年代初的时候讲一定要把你煽呼得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的，他都没有，他都是平和，在那个时代他确实是不入流的，或者是不太被人重视的，但是少量的人开始知道，他最早的感觉就是文学作品还可以这样写，因为他一路的创作风格，中国古代是有一派的，但起码到建国前后，建国前已经不是很多了，解放以后基本就没有了，所以好多读文学作品的人就不知道这个东西还可以这么些，我们当时也不知道，所以开始不是很接受，因为我们从小受的教育不是这种教育，包括散文之类的那些都是学的阳朔、秦穆的都不多，阳朔是进了教材的。

但那个时候影响力非常大，但是他对这一块，他可以说深恶痛绝，我记得有一次，那时候我都上大学了，我回家背古文，开着收音机，那边播着阳朔的哪篇散文，《荔枝蜜》还是什么，老头儿就从旁边那屋气冲冲的出来了，说关了关了，这种东西太恶俗了，这个散

文配乐本身就不行，文章也是，太恶俗了，说中国散文一错于刘白羽，二错于阳朔，说你们绝对不能学这个，特别的激烈，平常他没有这个。但那个时候，那些是主流，慢慢的本身时间长了以后，接触各种的文体比较多了，你在比较之中才能确定，这个确实有一个过程，严格说我们家可能最不适合干文字的就是我，我从小没这习惯，但是慢慢的，还写两篇东西，如此而已。



（汪曾祺）

现在看，肯定是慢慢的，他的东西是越看越有味，而且你什么时候看都能够看进去。

推荐阅读：《旅食与文化》

作者：汪曾祺

出版：九州出版社



内容简介：

《旅食与文化》是汪曾祺生前亲自编定的一部散文集，主要收录他一生记旅行和谈饮食的美文。本书绝版多年，此为精校后新版。汪曾祺是沈从文先生的学生，也是其文学的传人，作品中蕴涵无限的生活热情和雅致的韵味。汪老也是性情中人，自然洒脱，喜欢旅行和美食，他曾感叹：“活着多好呀！”

“讀·享·團” 简介：



“读·享·团”是九州出版社主办的官方读书会，以好书分享为主旨，邀请学者、名家进行读书沙龙讲座为主要活动形式，介绍好书，交流思想，倡导独立思考，不定期举办。我们会将最新活动通知，活动现场文字、图片、视频资料通过邮件的形式与会员分享，并会有不定期赠书活动。享受阅读、分享智慧，扫描二维码，一起加入九州读书会吧！





苏轼：浣溪沙从泗州刘倩叔游南山

©(宋)苏轼/文



元丰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从泗州刘倩叔游南山。

细雨斜风作晓寒，
淡烟疏柳媚晴滩。
入淮清洛渐漫漫。

雪沫乳花浮午盏，
蓼茸蒿笋试春盘。
人间有味是清欢。





王云五：怎样精读一本书？

◎ 王云五/文

对于应当精读的书采取精读的方法，不仅要一字不苟，一词不苟，而且对于其书的体制与背景都不可轻易放过。……

对

于应当精读的书采取精读的方法，不仅要一字不苟，一词不苟，而且对于其书的体制与背景都不可轻易放过。这样的读书方法，自然要比略读慢得多。不过持之以恒，正如里谚所谓：“积丝成寸，积寸成尺，尺寸不已，遂成丈匹。”



(王云五)

郑耕老的劝学篇称：“今取六经及论语、孟子、孝经以字数计之，毛诗三万九千一百二十四字，尚书二万五千七百字，周礼四万五千八百六字，礼记九万九千二十字，周易二万四千二百七字，春秋左氏传一十九万六千八百四十五字，论语一万二千七百字，孟子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孝经一千九百三字；大小九经字数合四十八万四千九十五字（这当然指正文而言，所有注疏皆未括入）；且以中才为率，若日诵三百字，不过四年半可毕……”

这些经书在旧日的读书人当然皆要精读，乍看起来，似乎庞大不易卒读；今照上开估计，只要持之以恒，

四年半便可毕读。经书因注疏较正文尤多，故读时稍缓；若为其他科类的书，无如许注疏者，精读之速度至少三四倍于此，是则四年之间，经过精读之书不会少过二百万言，亦不可谓少矣。

精读的书籍，如照上段开端所示，至少须有六项方法应当注意，这就是：（一）奠基，（二）循序，（三）明体，（四）析疑，（五）比较，（六）专志。兹逐项说明如下：

1. 奠 基

建筑须奠基础，读书何莫不然。读书的基础就是语文。语文是读书的必要工具，其中包括识字、辨名与文法三事。关于识字者，必须对于字音、字义与数字连用时的变义彻底了解。我国文字的六书中，虽以形声字占首分之八、九十，因此大多数的常用字皆可从字面上一看而知其读音和字义的大概，但是读音既多例外，字义的真相也未必尽能一望而知；加以数字运用时往往产生新的意义，不一定是可以望文生义的。因此，在精读时，必须时时对于不能彻底了解的字与词检查字典与词典。

关于辨名者，则宫室、服制、草木、鱼虫等，古今异名；对于读古书者，如采精读，均有考辨之必要。尔雅一书之所以列入十三经，亦即以读经须能辨名之故。至于现代的科学名词及地名、人名等，要知其真正的内容皆非检查百科或分科词典不可。

关于文法者，则古今文法亦有不同，精读古书者尤有研究古文法之必要。困学纪闻称：“东坡得文法于檀

弓，后山得文法于伯夷传。”盖谓从若干篇古文中精研其文法、文体与结构，即由此而可推及其他也。此外还有修习外国文而阅读其书报者，由于中外句法之不同，欲能了解其意义者，必须注重文法与析句，否则对于长至数十字之句，仅就字面解释，难免要生错误；且法律条文等一句之长往往有达数百字者，更易误会。



2. 循 序

宋朱熹说：“杂然进之而不由其序，譬如枵然之腹，入酒食之肆，见其肥羹大哉、饼饵脍脯，杂然于前，途欲左挈右攫，尽纳于口，快嚼而亟吞之，岂不撑肠挂腹，而果然一饱哉！然未尝一知其味，则不知向之所食者何物也。”此指读书不循序而求速之弊，此与论语所谓“欲速则不达，孟子所谓“其进锐者其退速”同一道理。

今世界任何事皆重计画，有计画则可循序进行，有条不紊，表面似乎缓进，实际即系稳进。读书亦如是，而精读之书，因有深浅之分，必须由浅入深，循序渐进，

始能收切实了解之效。

3. 明 体

凡精读之书，须先明其体制。书的大体包括：(1)学术流别，(2)作者立场，(3)时代背景。

所谓学术流别，例如读中国的经书，首须知道其有今文与古文两派，故读十三经注疏所收的尚书正义，因系古文传本，不少学者谓为伪本；明乎此，便须兼读汉伏胜所传的今文尚书大传，以资比较。

所谓作者立场，则如经济学的书籍有特予区别之必要。例如亚丹斯密之国富论，其中理论乃自资本主义之立场发挥；而马克思的资本论则以社会主义之立场而论列。

所谓时代背景，例如美人凯雷之地租学说甚著名，但凯氏生息之时代，美国人少地多，其学说固甚合当时事实；但时至今日，地少人多，则其理论已失去时代性了。

4. 析 疑

就是剖释疑义之意。要剖释疑义，则读书须先能怀疑。孟子说得好：“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宋程颐说“学者先要会疑”。可见古圣先贤对于读书皆主张能怀疑。

不过怀疑的意思，绝不可误解为事事须加挑剔；如此则对所读的书首先没有信仰，更何能因重视与兴趣而深切研究。清代李光地对此点说得很公允。他

说：“要通一经，须将那一经注疏细看，再将大全细看。莫先存驳它的心，亦莫存一向它的心。虚公其心，就文论理，觉得那一说是，或两说都不是，我不妨另有一意，看来看去，务求稳当，磨到熟后，便可名此一经。”由此可见所谓怀疑实在是用心的别称。

换句话说，就是对所读的书，就其所提倡的理论与方法认真思考，不可无条件接受；如认为不当也不要轻易武断。须再考虑作者所处的时代与背景，并悬想假使作者生于现代，处于现在环境，是否亦同此主张。如此用过一番心思，才可以作公允的评断也。



5. 比 较

是就同类书若干种比较其主张与叙述；这是精读方法最有效之一。关于比较其主张者，尤莫切于一经济一类的书籍。由于学者对许多经济问题的意见分歧，迄无定论；即有趋于一致的结论，也是暂时的，而非永久的，故宜同时参考不同派别者的主张。例如研究关税问题时，甲书详于保护政策，乙书阐发自由贸

易较精，彼此各有其重点，故有同时阅读以资比较之必要。

至关于叙述之事，试举历史为例。由于我国正史多是后一朝代的政府为前一朝代而修撰，凡不利于修史的朝代，自必为主隐讳，甚至变更其事实；故读正史之外，不能不兼读有关之稗史、野史、笔记、年谱及其他私家著述，以资比较。

6. 专 志

犹言专心致志。孟子说：“今夫奕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这是说任何事非专心致志不能有成；读书，尤其是应当精读之书，更属当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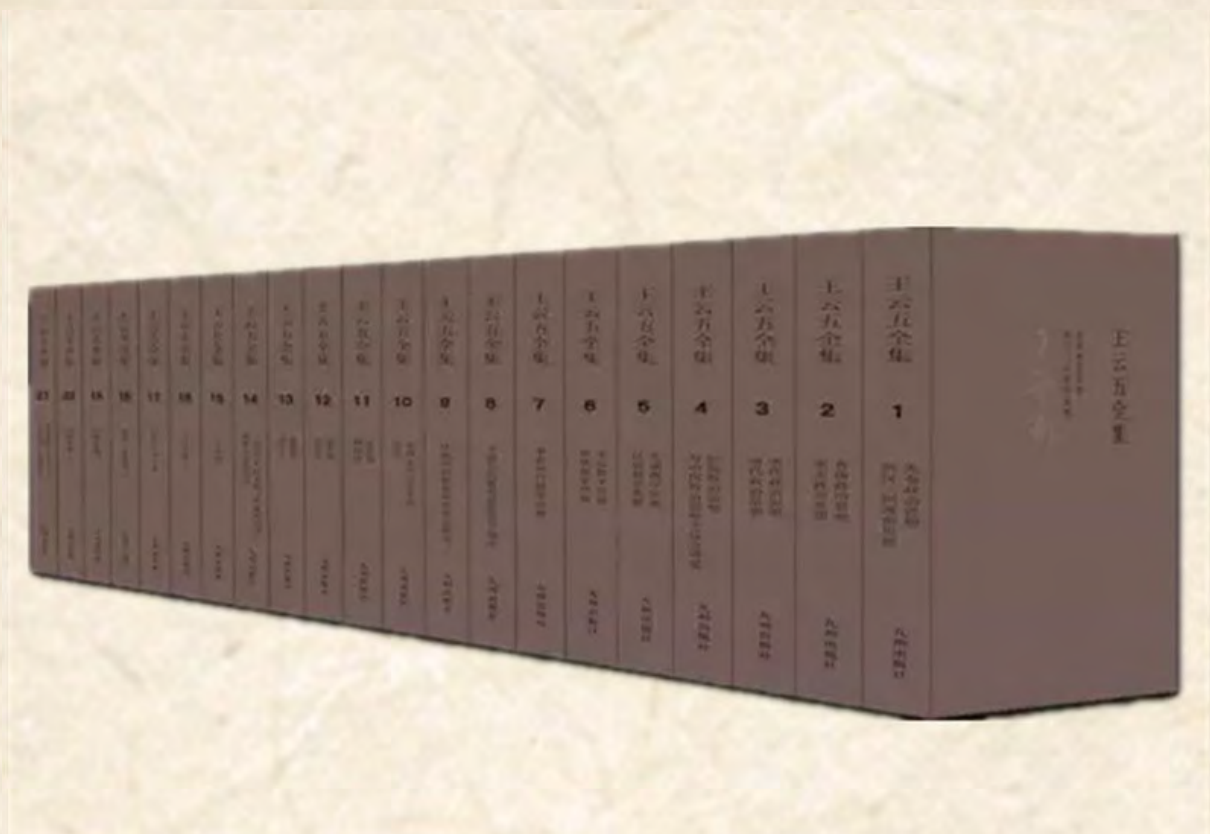
宋苏轼说：“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凡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欲求者耳。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人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一次求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仿此。此虽迂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此即西人所谓一时专做一事，亦即分工之意。如以此法用于精读之书，则读时当不止一遍，盖依分工之旨，每遍之目标不同，遂能专精，也就能够深刻。

（四二年十月为青年讲座播讲）

选摘自：《王云五全集·中国古今治学方法 论学》

作者：王云五

出版：九州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王云五全集(套装共20册)》，在台湾以《王云五先生全集》为题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次我社以简体字出版王云五先生的全部著述，在原版本的体例、格式、标号和文字等方面作了必要的整理订正，并省略各册相互重复的篇目，增补我们发现的著作。全集共20册30种，700余万字，内容保留原貌。





梁启超——一位父亲的来信

◎周质平/文

在近代中国人物中，能够文章、事功、家庭兼顾的实在不多，梁启超是少数中的翘楚。……

在近代中国人物中，能够文章、事功、家庭兼顾的实在不多，梁启超是少数中的翘楚。梁氏的家书打破了中国家书“庭训”的传统，在“规劝”、“针过”、“励志”之外，别立了“谈心”、“抒怀”和“思念”的新典型。这些家书不但可以当书信读，也可以当梁氏的日记读，梁氏的自传读，而更重要的是可以做“模范父亲指南”读。



（梁启超）

梁启超的婚姻是旧式的一妻一妾，但他与孩子的关系，却绝不是“庭训”式的“父子责善”。在他的家书里，我们看不到疾言厉色的训斥，也看不到居高临下的道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慈爱、热情而又体贴的父亲，在窗前灯下，与他的孩子们娓娓话家常，谈自己的悲喜，对子女的相思。

梁氏在家书中也谈国家大事和孩子们的学业，但即使这种比较严肃的题目，笔调还是亲切的。若借用

林语堂的说法，则梁启超的家书是带著小品文的笔调，而没有官样文章的“方巾气”。

在称呼上，梁启超的家书打破了“字谕某”，或仅呼其名的方式，而代之以“我的宝贝思顺（梁氏长女）”，“小宝贝庄庄（梁氏二儿）”，有时则径称“大大小小的孩子们”。

一般说来，中国父母比较不擅于表达对子女的关爱思念之情，或者说，表达的方式比较含蓄。梁启超则不然，他对子女的爱是形诸笔墨的。用“笔锋常带感情”来描述他的家书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在1927年6月15日《给孩子们书》中，梁氏说：“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这种“十二分热烈”的“爱情”，在梁氏家书中是随处可见的，尤其以写给长女思顺的信为最。

梁启超的家书绝非一般所谓的“平安信”可比。梁氏的家书有实质情感和知识的交流，少了一些传统家书的框架，却加进了真实的内容。



（1908年，梁启超的九个子女于横滨双涛园合影）

梁启超说他自己有时“带孩子气”、“有童心”，这也可以从他家书中看出。1920年1月26日，他在协和医院病床上，写了一封信给“大孩子、小孩子们”：

贺寿的电报接到了，你们猜我在那里接到？乃在协和医院三〇四号房。你们猜我现在干什么？刚被医生灌了一杯蓖麻油，禁止吃晚饭。活到五十四岁，儿孙满前，过生日要捱饿，你们说可笑不可笑？(Baby：你看！公公不信话，不乖乖过生日还要吃泻油，不许吃东西哩。)

我这封信写得最有趣，是坐在病床上用医院吃饭用的盘当桌子写的……

我写这封信，是要你们知道我的快活顽皮样子。

这样带有幽默而又亲切的“父示”，在中国家书中是不可多得的。梁启超晚年给孩子们的信，有极生动活泼的白话，这种“明白如话”的文字是“至亲无文”最好的说明。如1922年12月2日《与思顺书》中，有这样

的话：“我的宝贝思顺……我很后悔，不该和你说那一大套话，只怕把我的小宝贝急坏了，不知哭了几场？”



（1934年，梁思宁、梁思懿、梁思礼、梁思达（左起）在天津“饮冰室”前）

又在同月8日的信中，以“怎么啦！吓着没有？”起头，同月18日信中又有“我又想起你来了，说不写信又写了。”

这样的文字，使书信成为“对话”，而不是“独白”。

梁启超也常和思顺谈家居琐事，从一些细小的叙述中，不但可以看到梁氏一部分的家居生活，也可以看出他和孩子们相处，是如何的乐在其中：

老白鼻（按：即 Old baby，指梁氏幼子思礼）一天一天越得人爱，非常聪明，又非常听话，每天总逗我笑几场。他读了十几首唐诗，天天教他的老郭（梁家工人）念，刚才他来告诉我说：“老郭真笨，我教他念：‘少小离家’，他不会念，念成‘乡音无改把猫摔’（他一面

说一面抱着小猫就把那猫摔下地，惹得哄堂大笑)。”

梁启超晚年患“血尿”，病逝于1929年1月19日，死前3个月(1928年10月12日)，有信给思顺，其中有一段说到他渴望和儿孙们团聚：

我平常想你还自可，每到病发时便特别想得利害，觉得像是若顺儿在旁边，我向他撒一撒娇，苦痛便减少许多。……现在好了，我的顺儿最少总有三五年依着我膝下，还带着一群可爱的孩子——小小白鼻接上老白鼻——常常跟我玩。我想起八个月以后的新生活，已经眉飞色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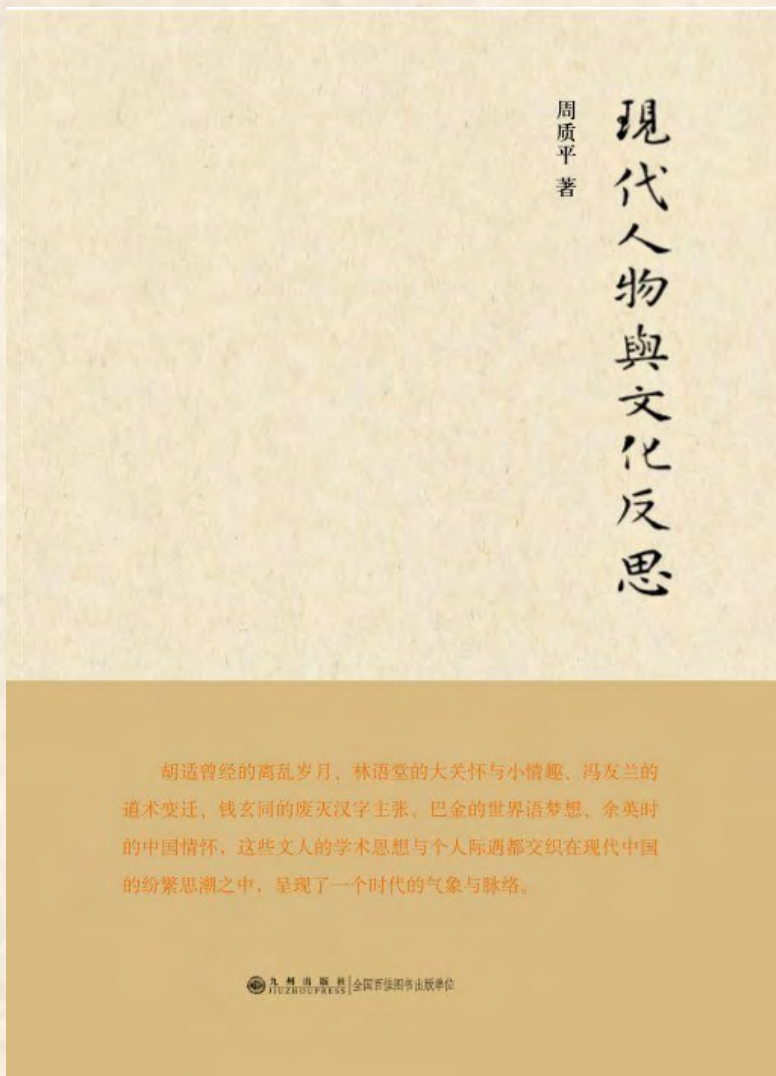
父亲向女儿撒娇，这是何等和乐的父女亲情。

虽然梁启超等不及过他儿孙团聚的“新生活”，但他在给孩子们的信中所作的忠实纪录，不但丰富了中国家书的内容，也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庭生活提供了一个真实而又令人羡慕的典型。梁氏充满挚情的家书一改中国传统“严父”的形象，而代之以一个可亲可爱，可以中夜对谈的朋友。

本文摘自《现代人物与文化反思》

作者：周质平

出版：九州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收录了周质平先生多年来有关现代学人与文化反思方面的文章，共分三个部分。

人物研究中涵盖了胡适、林语堂、赵元任、余英时等现当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学者，论述着重在思想史层面的分析。

语文发展的内容，重点关注现代中国汉字命运的探讨以及简化字、世界语等话题，对百年来的语文发展提出独特的见解。

随笔杂文部分，汇集了作者近20年来文化反思方面的文章，内容精练，论断清晰，为读者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



袁世凯遗嘱

◎夏双刃/文

袁世凯称帝不成，又想回头做他的大总统。结果不仅西南护国军方面和独立各省不同意，就是北洋系的骨干冯国璋等人也坚决反对。时袁世凯已忧惧成病，又被一碗“二陈汤”灌下肚去，终于不治。……

袁

世凯称帝不成，又想回头做他的大总统。结果不仅西南护国军方面和独立各省不同意，就是北洋系的骨干冯国璋等人也坚决反对。时袁世凯已忧惧成病，又被一碗“二陈汤”灌下肚去，终于不治。



（袁世凯）

他于最后的时间里，似已深自悔恨，遂重新启用了当初拒不合作的老朋友徐世昌和老部下段祺瑞。这两个人也是他的病榻托孤之臣，他执徐世昌之手，用最后的力气呜咽道：“我被群小所误，以至于有今日。幸亏国事有依法承继之人，可以不必担心了。宋卿（黎元洪）虽没什么雄才大略，但若兄和芝泉（段祺瑞）象周公、召公夹辅成王那样，收拾时局，应非难事。”

他预藏于金匱之内的继承人名单，也已由“黎元洪、袁克定、徐世昌”易为“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而他尚留有遗书一联，置于案上，最令后人争议不已：

“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看来，他确实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称帝的错误，所以要“看中国再造共和”。一失足成千古恨，就在这一句“看中国再造共和”里体现无遗，读来令人唏嘘不已！

可是，众所周知，他在帝制自为的同时，即与日本签订了亡国灭种的《二十一条》。他因此已不仅是一个窃国大盗，更是一个最大的卖国贼。那么，他又何以王婆卖瓜，说什么“为日本去一大敌”呢？



（袁世凯称帝前在天坛祭天）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日本对德宣战，遂出兵侵占德国的殖民地青岛，并占据胶济线。德国此时有意将胶州归还中国，但日本越俎代庖地坚决不允，且显然有霸占山东全省的意思。

此时，袁世凯政府强烈抗议，日本均置若罔闻。袁世凯又诉诸英、美两国，乞求主持正义，英、美乃合力劝阻日本，但日本不予理睬，且一度想刺杀周旋于英、美之间的中国外交家顾维钧。然日本最令人毛骨悚然之处，则是抛出一个旨在将中国变成又一个朝鲜的《二十一条》。

日本作为一个孤悬大洋之中的岛国，接受的却又是大一统的中华大陆文明，其对大陆的渔猎之心，虽逾千年未尝稍变。

中日之间的恩怨是非，只须举出一个简单的事例便足以辩明，不须多费唇舌：中日做了几千年的邻居，在冷兵器时代，中国一直强于日本，但除了蒙古人的元初之外，从未进攻过日本，也从未想过要进攻日本；日本则截然相反，从唐朝到明朝，不断地派军队和海岛进攻大陆，到了明治维新后的第二年，它的侦察船只便已出现在上海海面。它的处心积虑实在匪夷所思，令人脊背生寒。

而在侵略他国的具体行为方面，日本又极尽狡诈和霸道，往往非常人所能理解，非常理所能解释。《二十一条》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日本的想法是，要抢在欧战结束之间，完成独霸中国的局面，因此无论军事还是外交，一定要讲究一个“快”字。因此，它迫不及待地进攻山东，俨然以主人自居，此后更威胁各国不得干预。其蛮横无理，已是无以复加，不料更抛出《二十一条》，要求中国接受这些条款不说，还威胁中国不得走漏消息给别国，显然它也自知理亏。

《二十一条》分列五号，每号包括若干条，合计二十一条。主要内容是：

第一号四条，要求享有德国原在山东的一切权益，中国不得将山东省的土地和沿海岛屿出让或租与他国，日本得在省内建筑铁路，开辟主要城市为商埠。

第二号七条，将旅顺、大连租界期限和南满、安奉两铁路交还期限，均延展至九十九年为期，日本人在南满和东蒙享有土地租界权或所有权、居住权，以及开矿等各种权利。

第三号二条，要求将汉冶萍公司中日合办，其附近之矿山，不准公司以外之人开采。

第四号一条，要求中国不得将沿海港口、海湾及岛屿，出让或租与他国。

第五号七条，要求聘用日本人充任政治、财政、军事顾问，日本人在中国内地所设之医院、寺院和学校有土地所有权，中日合办警政和军械厂，在武昌与九江、南昌间及南昌与杭州、潮州间建筑铁路，福建省内铁路、矿山建筑、开采，日本有优先权，有在中国传教权。

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是看准了时机的。首先，西方列强忙于欧战，无暇东顾。其次，袁世凯已有称帝之心，日本遂欲以此“二十一条”作为支持他称帝的条件。

因此，在提出《二十一条》的同时，日本还对袁世凯恩威并御，一方面许诺归还青岛，帮助镇压革命党和宗社党，另一方面又派兵强占山东，并大力帮助革

命党、宗社党人遣返国内，将中国搞得一团混乱，以逼袁世凯就范。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将这一密约面呈袁世凯，并再三告诫要绝对保密。但袁世凯十分明白，中国的自救之道，便是将这“二十一条”公之于众，让世界干预此事。于是，顾维钧化装进入英、美使馆，翌日，“二十一条”即成为西方媒体的头条新闻。日本的阴谋被揭发，从而陷入相当被动的境地。



（袁世凯与各国使节的合影）

此外，袁世凯对条约本身进行了据理力争，他声色俱厉地告诉日使：“可让步者自然可以谈判，但不可让步者，诸如第五号诸条，根本就没有谈判的可能性。”

然随着日本的跋扈日甚，袁世凯的策略转为消极拖延，以待友邦支援，并派有贺长雄赴日本游说政坛人物。以陆徵祥为首的中国外交团仰承袁世凯的指

示，拖延不决至于四个月之久，这时国内外反日呼声日渐高涨，日本遂被迫主动放弃第五号中的七条。

然而，日本旋即发出“最后通牒”，声称日本海军已整装待发，若不签约，后果自负。袁世凯遂于5月25日，与日本人签订了这个城下之盟《中日新约》。虽然他的条款已不足二十一个，但后人仍习惯性地称之为“二十一条”。



（“二十一条”签字时中日代表合影。左起：（中方）外交次长曹汝霖、外交总长陆徵祥、秘书施履本；（日方）参赞小幡西吉、驻华公使置益、书记官参赞高尾）

饶是如此，由于是“空手套白狼”，日本仍视之为重大外交胜利。不仅日本举国狂欢，便是在北京的日侨也饮酒舞蹈，高呼“大日本帝国万岁”，令人侧目。而袁世凯则在国务会议上作声泪俱下。他说：

“……我国虽弱，苟侵及我主权、束缚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尽日本最后通牒将第五号撤回不议，凡侵及主权及自居优越地位各条，亦

经力争修改,并正式声明,将来胶州湾交还中国,其在南满内地虽有居住权,但须服从我警察、法令及课税,与中国人一律。

以上各节,比初案挽回已多,于我之主权、内政及列国成约虽尚能保全,然旅大、南满、安奉之展期,南满方面之利权损失已巨。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谍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无敌国外患国恒亡,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

则朱使(指英使朱尔典)所谓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之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以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我负国民托付之重,决不为亡国之民。但国之兴,诸君与有责;国之亡,诸君亦与有责也。”

他还专门向全国百官职司发出一道密谕,要求大家日以“亡国灭种”四字悬诸心目,激发天良,屏除私见,各尽职守,云云。此外,他还令丁佛言撰写了《中日交涉失败史》一书,印五万册,秘密寄存于山东模范监狱内,期冀日后形势逆转后,可以公开发行。

俗云“知耻而后勇”,然而袁世凯虽知其耻,却没有一心一意求发展,而是一门心思要当皇帝。两事相加,失尽民心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纵览袁世凯的一生，确曾是日本的一个大敌，但日本更是他的大敌。当年驻戍朝鲜时，他两次把日本人赶出了朝鲜，被日本人视为大敌。

当时的日本，国力和军力还远不够强大。然而，甲午战争后，日本强迫中国签订了《马关条约》，得到了相当于其战争投入之四十倍、其上年度财政总收入三倍的回报，一夜暴富。他使用这些得自中国的不义之财发展军备，再回过头来侵略中国。

日本趁欧战而侵华，这对袁世凯来说，实为不幸！袁世凯自然明白中国决不是日本的对手，因此明知《二十一条》是卖国条约，但也不得不签。而其签约后，信誓旦旦要报仇雪耻的态度，也显然是无可厚非的。只是他耽迷于帝制自为，将报仇大事暂抛脑后，直到人之将死才天良发现、“其言也善”起来，实足唏嘘！



（由袁世凯签字的《民四条约》）

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便如一片阴霾一样笼罩在中国大地上，对许多具体而微的人和事均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拿袁世凯为例，至死都把日本当做一个大敌，耿耿于怀，甚至死不瞑目。而袁世凯之后的六届北洋政府元首中，除黎元洪归隐、冯国璋早逝外，其余四人即徐世昌、曹锟、段祺瑞、张作霖，均受到日本人的“重点关照”。

徐世昌晚年居住在天津租界内，30年代多次拒绝日本人的拉拢，1939年生病后，因恐被日本人扣留而拒绝外出就医，遂致不治。曹锟也多次拒绝了日本人的拉拢，1938年郁郁寡欢地死在天津租界内，他的爱将吴佩孚则于翌年被日本牙医害死。至于张作霖，则因拒绝继续与日本人合作，而被炸死于皇姑屯。

这些人均在最后关头秉持民族大义，拒绝与日本合作，故被日本人视为敌人，因此，他们的死，都可以说是“为日本去一大敌”。

本文摘自：《乱世掌国：平议民国大总统》

作者：夏双刃

出版：九州出版社



内容简介：

从1912年袁世凯上台到1928年张学良易帜，是中华民国的北京政府时代。鉴于其军阀色彩，史家通常称之为“北洋政府时期”。

走上北洋政府权力巅峰的，前后有七个人，即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段祺瑞、张作霖。他们所处的时代，固亦属于李鸿章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却与晚清大相径庭：一方面，帝制终结，共和创立；另一方面，帝制常有鲁阳挥戈的可能，共和却无取信天下的能力。

这七个人在这一段重要历史中，扮演了非比寻常的角色。本书在主流史学观基础上，力求采原始史料，以期完整展示他们的际遇沉浮，全面塑造他们的人物形象。读者可做小传读，亦可做信史看。





李贽：另类思想家(五)

◎曾纪鑫/文

李贽不断求索,大胆怀疑,快意恩仇,诚如他自己所写的那样:
“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



（李贽故居）

李贽不断求索，大胆怀疑，快意恩仇，诚如他自己所写的那样：“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专制统治者以孔子的儒学为正统，其余皆为旁门左道，他们只希望天地间存在一个头脑、一种声音，更希望满天下都是愚民，半点也容不得其他学说与主张。而李贽作为专制社会难得的“千古绝唱”，偏偏什么也不信，为了科举从小熟读四书五经，却不信孔孟朱熹之说；出家当和尚，却不信佛教；对老庄学说素有研究，却不信神仙道教……不盲从，不迷狂，永远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一颗难得的童心，保持个体本真及与生俱来的自由平等与独立人格。正因为如此，李贽被专制统治者、卫道士视为异端，无论哪里都容不下他，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笔者曾经对李贽这种大无畏的反叛精神难以理解，在长夜漫漫、举世萎靡、万马齐喑的专制社会里，李贽桀骜不驯、奋力抗争的内在动力源于何处？

当我移居厦门，感受着厦门、泉州、漳州三地的闽南文化氛围，这才找到了一点答案。当然，也只是多解中的一解。



闽南人由中原移民而来，或避战乱，或不堪统治当局的压迫，他们不畏艰险、攀山越岭、不断南迁，来到了中原的边缘，当时的化外之地——福建最南端。长期的边缘生存形成了闽南人内在而强烈的个性特征——反叛，另类，与中心、正统悖逆，充满野性与活力，敢说敢干，敢拼敢闯，不畏强权，不甘压迫，奋勇抗争……当然，也不排除偶尔胡闹一下，你说东我偏要说西，你说黑我硬要说白，喜欢对着干。

李贽是一位典型的闽南人，在闽南生活二十九年后才离开泉州，其身上的闽南文化特征相当突出。然而，闽南人在本地生活，融于同样的文化圈中，这种性格不是那么鲜明，一旦他们走出闽南，走出福建，就格外突出而彰显了。外出的闽南人大多经商、从政，当李贽将闽南人的个性在哲学与思想领域予以淋漓尽致的发挥之时，便射出了一股奇异而夺目的光芒。

正因为李贽的反叛、不屈与受罪，才成就了今日我们所知道李贽。

李贽同代之人，不论其敌友，也多因为他的存在而进入后人视野。一部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也因为李贽的存在而透出些许亮光、暖意与色彩，才不至于让我们感到过于沉闷、失望与悲观。

李贽虽死，却成为中国启蒙思潮的一面旗帜，他的思想不仅影响了后来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曹雪芹、谭嗣同、严复、章炳麟等人，还传至日本，受到日本明治维新运动先驱吉田松阴等人的推崇与喜爱，对日本明治维新运动有着功不可没的推动与启发。



（吉田松阴）

我们将李贽放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历史长河中，当会发现，他的学说有两个特征，一是惊世骇俗，二是进步卓越，其识见远远超出前人与他人。

如果将他放在整个世界哲学、思想发展史中，将他与前后时代的西方哲人、学人进行比较，又是怎样的一番情形呢？

当时的西方，即将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启蒙运动，涌现出了一大批先驱人物，如哲学家笛卡尔、斯宾诺莎，宗教改革家加尔文，思想家弗朗西斯·培根、托马斯·莫尔、康帕内拉，文学家莎士比亚、塞万

提斯，科学家伽利略、布鲁诺、哈维，等等，一个个都称得上一代历史巨人。由他们所支撑的西方社会，正经历着一场史无前例的革新与突破，开启了近代文明的先河。

但明王朝正陶醉在天朝大国唯我独尊的迷狂中故步自封，从皇帝到大臣，皆视外人为未开化的蛮族，视其他各国为蛮夷小国。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在传播天主教的同时，带来了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如历法、算术、世界地理知识等。李贽曾与利玛窦有过三次会面，为他题扇、赠诗，双方都非常看重彼此间的交往，并撰文记述。



（利玛窦（左）与徐光启（右））

置身封闭环境中自我探索的李贽，对西方文明知之甚少，他不知道地理大发现，不知道地球仪上的经度、纬度、赤道、五带，不知道自鸣钟之类产品的科学原理……在好奇与询问中，李贽多少有些了解，终归难以穷究。李贽作为当朝知识分子中的卓异者、清醒者也仅只如此，遑论他人！由此可见，中华民族的落伍并非一朝一夕形成。李贽虽然不知当时的明朝已落后于世界历史潮流，但已隐约感到华夏文化，特别是占支配地位的孔教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差距，因此也更加坚定了探索真知实学的勇气与决心。

关于李贽的身份定位，我更倾向于称他为思想家而不是哲学家。中国古代缺少西方那种具有本真意义的抽象思辨哲学，李贽的哲学思想主要在随机论辩中形成，谈不上严格的思想体系，也许，他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去构建西方如黑格尔那样博大精深、无所不包的哲学系统。在此，我们并非以西方的哲学观念、哲学形态衡量、规范中国的传统哲学，但只要我们客观一些，公正一些，就会觉得支撑哲学大厦的，不是感性，不是零碎的体悟，也不是散漫的语录对话，而是抽象思维、逻辑推理、严谨体系。哪怕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古代哲学家朱熹，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有着一定逻辑思辨作支撑的理学思想体系，但只要与西方哲学稍作相较，就可见出那无法克服的漏洞与缺憾。民族思维方式决定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特征，但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古人的思维范畴与模式之中。

当中西文化真正交流、交融之时，也是我们对民

族新思维,对新型的中国哲学抱有绝大的期望之时。

一个没有思想的人无疑是一具行尸走肉,同理,一个缺少哲学与思想的民族也是平庸而可悲的民族。中华民族要崛起,要有所创造,要跻身于世界民族强林,非得有一流的、真正的、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为先导不可。正是从这样的角度与意义而言,李贽对于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对中华民族的未来,实在是太重要太重要了!

本文摘自:《历史的砧码:从边缘影响历史的11个人》

作者:曾纪鑫

出版:九州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选取对中国历史产生过一定影响的十一位边

缘人物，将他们置放在当时的历史舞台，厘清成长线索，还原事实真相，对其生命活动、心路历程、性格特征、智慧经验、人格力量、功过是非等诸多方面予以描述、阐释与评说。



胡适：人生“十诫”

◎ 胡 适/文

人生是什么？人生是
啥物事？……

现

在先讲第一点，就是人生是什么？人生是啥物事？拿科学的研究结果来讲，我在民国十二年发表了十条，这十条就是武昌有一个主教，称为新的十诫，说我是中华基督教的危险物的。十条内容如下：



1. 要知道空间的大

拿天文、物理考察，得着宇宙之大；从前孙行者翻筋斗，一翻翻到南天门，一翻翻到下界，天的观念，何等的小？现在从地球到银河中间的最近的一个星，中间距离，照孙行者一秒钟翻十万八千里的速率计算，恐怕翻一万万年也翻不到，宇宙是何等的大？地球是宇宙间的沧海之一粟，九牛之一毛；我们人类，更是小，真是不成东西的东西！

以前看得人的地位太重了，以为是万物之灵，同大地并行，凡是政治不良，就有彗星、地震的征象，这

是错的。从前王充很能见得到，说：“一个虱子不能改变那裤子里的空气，和那人类不能改变皇天一样。”所以我们眼光要大。

2. 时间是无穷的长

从地质学、生物学的研究，晓得时间是无穷的长，以前开口五千年，闭口五千年，以为目空一切；不料世界太阳系的存在，有几万万年的历史，地球也有几万万，生物至少有几千万年，人类也有二三百万年，所以五千年占很小的地位。明白了时间之长，就可以看见各种进步的演变，不是上帝一刻可以造成的。

3. 宇宙间自然的行动

根据了一切科学，知道宇宙、万物都有一定不变的自然行动。“自然自己，也是如此”，就是自己自然如此，各物自己如此的行动，并没有一种背后的指示，或是一个主宰去规范他们。明白了这点，对于月蚀是月亮被天狗所吞的种种迷信，可以打破了。

4. 物竞天择的原理

从生物学的智识，可以看到物竞天择的原理，鲫鱼下卵有几百万个，但是变鱼的只有几个；否则就要变成“鱼世界”了！大的吃小的，小的又吃更小的，人类都是如此。从此晓得人生不受安排，是自己如此的行动；否则要安排起来，为什么不安排一个完善的世界呢？



5. 人是什么东西

从社会学、生理学、心理学方面去看，人是什么东西？吴稚晖先生说：“人是两手一个大脑的动物，与其他的不同在程度上的区别罢了。”人类的手，与鸡、鸭的掌差不多，实是他们的弟兄辈。

6. 人类是演进的

根据了人种学来看，人类是演进的；因为要应付环境，所以要慢慢的变；不变不能生存，要灭亡了。所以从下等的动物，慢慢演进到高等的动物，现在还是演进。

7. 心理受因果律的支配

根据了心理学、生物学来讲，心理现状是有因果律的。思想、做梦，都受因果律的支配，是心理、生理的现象，和头痛一般；所以人的心理说是超过一切，是不对的。

8. 道德、礼教的变迁

照生理学、社会学来讲，人类道德、礼教也变迁

的。以前以为脚小是美观，但是现在脚小要装大了。所以道德、礼教的观念，正在改进。以二十年、二百年或二千年以前的标准，来判断二十年、二百年、二千年后的状况，是格格不相入的。

9. 各物都有反应

照物理、化学来讲，物质是活的，原子分为电子，是动的，石头倘然加了化学品，就有反应，像人打了一记，就有反动一样。不同的，只在程度不同罢了。

10. 人的不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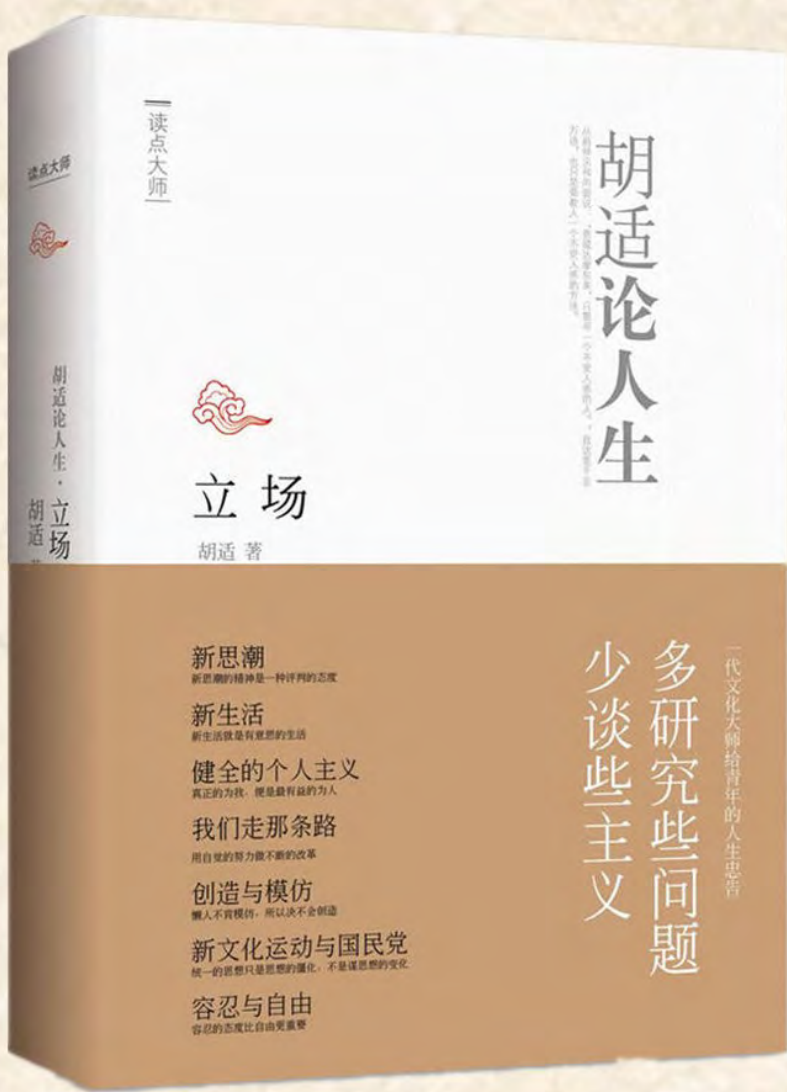
根据一切科学智识，人是要死的，物质上的腐败，和猫死狗死一般。但是个人不朽的工作，是功德：在立德，立功，立言。善恶都是不朽。一块痰中，有微生物，这菌能散布到空间，使空气都恶化了；人的言语，也是一样。凡是功业、思想，都能传之无穷；匹夫匹妇，都有其不朽的存在。

我们要看破人世间，时间之伟大，历史的无穷，人是最小的动物，处处都在演进，要去掉那小我的主张，但是那小小的人类，居然现在对于制度、政治各种都有进步。

本文摘自《立场：胡适论人生》

作者：胡适

出版：九州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胡适先生平生多种著述，以片断体、语录体的形式全新编排，内容详尽充实，涉及文化、治学、时政、人生、文学等方方面面，胡适的重要著作、优秀著作均收录其中。本书尽量保持原作风貌，原汁原味地再现一代大师的风采。



大寒篇·第43期

主办:九州出版社

出刊:廿四节气,逢节气出刊

数字出版:@朱国政

排版制作:@唐文洁

文稿整理:@冯冯

统筹:@一木

往期回顾:当当读书

【往期回顾地址】



Copyright ©2017年
九州出版社《读·享|九州》
微信订阅号:jzhpress
读享九州 陪伴四季

大寒

